

《船娘之歌》中的物叙事与加勒比华裔文化身份建构

朱露露*, 苏 婷#

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18日

摘 要

圭亚那华裔作家美玲·金的短篇小说集《船娘之歌》以殖民权力结构与种族歧视为核心议题, 将流散经验与身份认同问题置于叙事中心。作品书写圭亚那独立史与契约华工在殖民历史进程中的生存境遇, 关注华人女性在殖民地和本土国家的交叉社会身份及其历史主体性的构建过程。小说文本构建起一个鲜活的物质性场域, 通过具体“物”的呈现与流转, 投射加勒比华裔个人生活与集体记忆的真实面貌。人类主体与无生命的物之间的互动性构建具有多重功能, 尤其在推动叙事发展进程、展露人物性格特征、阐释文化符号表征等方面作用明显。本文以“物”叙事为切入点, 以《船娘之歌》为研究文本, 为探讨当代加勒比华裔个体身份建构与族群归属感提供新的理解路径。

关键词

《船娘之歌》, 物叙事, 文化身份, 加勒比华裔, 华人女性

Thing Narrativ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aribbean-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in *Song of the Boatwomen*

Lulu Zhu*, Ping S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March 23, 2026; accepted: June 10, 2026; published: June 18, 2026

Abstract

Guyanese-Chinese author Meiling Jin's short story collection *Song of the Boatwomen* takes colonial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power structures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as its core issues, placing diasporic experiences and identity at the center of its narrative. The work depicts the history of Guyana's independence and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indentured Chinese laborers during the colonial era. It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dually marginalized identity of Chinese women in both the colony and the metropole,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ir historical subjectivity. The text constructs a vivid material field, projecting the authentic personal lives and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Caribbean-Chinese community through the present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specific "object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constructed between human subjects and inanimate objects serves multiple functions, playing a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role in advancing the narrative, revealing character traits, and interpreting cultural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Taking "thing" narrative as a starting point and *Song of the Boatwomen* as the primary text,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dividual identity and the sense of ethnic belonging among contemporary Caribbean-Chinese people.

Keywords

Song of the Boatwomen, Thing Narrative, Cultural Identity, Caribbean-Chinese, Chinese Wome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船娘之歌》(Song of the Boatwoman)是圭亚那华裔作家美玲·金出版的第三部作品,作者自身的离散经历与圭亚那复杂的种族问题和政治语境使其作品兼具跨文化视野。《船娘之歌》共收录12篇短篇小说,包括《维多利亚》(Victoria)、《高大的阴影》(The Tall Shadow)、《船娘之歌》(Song of the Boatwoman)、《金萨:一对之二》(Kin-sa: Second of a Pair)、《三乳女人》(The Three-breasted Woman)、《熊女》(Bear woman)、《完美的秘书学院》(Perfect Secretarial College)、《短线》(Short Fuse)、《不安的生活》(An Uneasy Life)、《解开绳结》(Unravelling the Knots)、《归乡》(Homecoming)、《晚安,爱丽丝》(Goodnight, Alice)。这些故事聚焦于生活在伦敦、中国、加利福尼亚、马来西亚和加勒比的女性群体,以丰富的想象和奇幻的风格叙述种族、性别、性取向等多重主题。近年来,加勒比华裔文学逐渐受到学界关注,但总体研究规模仍较为有限,相关讨论主要集中于离散经验、族裔认同以及跨文化身份建构等议题。丽萨·云(Lisa Yun, 2008)指出,美玲·金通过华裔离散叙事展示加勒比社会多元文化交汇的历史现实,并在文学层面呈现出华人群体在该地区文化形成中的重要位置[1]。朱迪思·米斯拉希·巴拉克(Judith Misrahi-Barak, 2012)则从语言、地理与文化等多个维度分析文本中的“中国性”(Chineseness),认为这种身份表征既包含历史记忆,也体现出跨文化协商的复杂过程[2]。安妮·玛丽·李-洛伊(Anne-Marie Lee-Loy, 2011)通过对小说集中相关篇章的细读,探讨华人离散叙事与加勒比殖民历史之间的交织关系,强调华裔群体在地区历史叙事中的特殊地位[3]。相比之下,国内学界对该小说集的研究起步较晚且成果较少。苏娉(2019)主要从离散文学视角出发,关注作者对华人移民离散经历及其文化影响的书写[4]。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在揭示文本中的族裔身份与离散经验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多侧重宏观文化与历史层面的阐释,对于文本内部叙事机制,尤其是非人物质要素在意义建构中的作用关注不足。

“物”始终是学术界持续探讨的核心命题,文学研究领域更是在近代掀起一股显著的“物质转向”浪潮,学者开始空前重视“物”的本体能动作用以及“人-物”之间双向建构的互动机制。在此基础上,

比尔·布朗(Bill Brown)的“物论”具有开创性意义,他率先将物质维度嵌入文学叙事的分析范畴,强调物的人与物主客体身份的交融互换,关注物质所承载的文化隐喻与意义网络,并肯定物作为客观具体的实体存在和对人的意义映射的特殊地位[5]。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打破传统的层级观念,在同一平面上赋予物以能动者属性[6]。简·本尼特(Jane Bennett)提出“物”之力量(thing-power)这一概念,用极力彰显非人类客体的自发性,及其对人类行为与心理层面的深远干预。为突破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布雷西亚(Ray Brassier)等人倡导“思辨实在论”,揭示客观存在的复杂性。哈曼推崇的“物导向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重申物的绝对平等与独立自主,并厘清感官层面与真实层面的物之差异。综上所述,随着人与物质客体关系的理论重构,将“物”的哲思嵌入叙事学研究,已然成为拓展文学研究边界的重要突破口。尽管“物质转向”已在文学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将物论视角与加勒比华裔文学相结合的研究仍相对有限。现有关于《船娘之歌》的研究多集中于身份政治与离散叙事,而对文本中频繁出现的物质意象及其在人物身份建构、文化记忆以及跨文化经验表达中的作用缺乏系统分析。

本文将“物”的理论维度引入《船娘之歌》的文学批评之中,借助文本细读法,探索无生命客体在族裔认同建构中的复合价值,从叙事学的“物”之功用出发,对作品中的物质图景展开研究。这些“物”首先作为中国文化的表征符号出现,继而深度介入人物性格的养成并诱发情节转折,最终在身份理论的映射下,这些物质载体被升华为加勒比华裔反思族裔根脉、确立文化主体地位的重要工具。

2. 物的象征与记忆功能：三月岛之誓与继承之物

文学批评多倾向于以人类为中心,将物降格为承载主体意识的客体或“他者”。时代变迁带动观念的变革,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逐渐被打破,同时不再仅从物的本质属性展开认知,而是深刻将其社会内涵纳入思考范畴,探究物背后隐藏的社会价值与文化背景对人物言语与行为的多重作用。布朗提出的“物之社会生活”理论肯定“物”的社会化媒介属性,认为物体可以在社会互动中反映或塑造身份和权力结构,从而深刻影响人物行为及其所处情境。学者萨图尔(Jennifer Sattaur)的“物理论”进一步扩充这一认知,认为物绝非仅是承载交换价值的载体,人们通过物“阐释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多重意义的交织使“物”跃升为一种文化符号[7]。正因如此,文学界开始热衷于挖掘“物”在文本中的叙事机制与象征潜能,在叙事中,“‘物’常被用作文化、历史、社会的隐喻”[8]。

作为短篇小说名的《船娘之歌》故事中,已到适婚年龄的主人公晓黄被家庭长辈安排进入一场包办婚姻,而她对此满是无奈与压抑。“阿婆不遗余力地赞美婚姻的美德,还暗示邻居赵氏的儿子是天选佳配”(31),家庭对其赋予浓厚的社会期待,更揭示传统文化对女性婚姻观念的束缚。然而,晓黄却对即将逝去的自由满怀悲痛与遗憾。她饱含这一沉重心情前往工厂从事流水线工作,好友哲花注意到晓黄忧郁与沉寂的状态便发起询问,后者如实表达自己的无奈处境后,哲花随即提出解决之道,即在三月岛观音像面前宣誓永不成婚,若有违反,“则投身于湖中”(p. 33)。这一举动实际借鉴19世纪广东地区自梳女的传统——她们以独身和自立为人生准则,使用“梳起”仪式宣告对传统婚姻的抗拒和对个人自由的追求。自梳女所用的发髻、独居生活的居所、宣誓的仪式等一系列物化符号,成为自我身份的具象表达,象征着不婚不嫁、不依附男性的独立选择。《船娘之歌》中,三月岛象征着中国的岭南文化,构建出一个民族文化的叙事空间。由包办婚姻展开的叙事实际上代表华裔流散者对于中国的眷恋,自梳女的形象不再局限于一种历史或物化符号,亦是文化身份抗争的象征,具有人格化与情感化。一些加勒比女性文本呈现出对传统浪漫叙事模式的反思与重构,忠于自我选择的人生,彰显出其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9]。

晓黄与哲花共同乘船抵达三月岛,但当她面对宣誓的选择时,内心却依然充满犹豫。哲花因不满晓黄的迟疑而离去,留其一人独自面对自己的孤独与困惑。晓黄在这孤寂的情境中沉沉睡去,醒来后发现返回的船只已不见踪影。在陷入绝望之际,一艘渡船浮现眼前,而掌托者正是历史上投湖自尽的一位自

梳女。这一场景赋予“船”一种独特的象征意义,自梳女的身份、其独立生活、以及她在船上的最终归宿,使船化身为其自我身份的延续。船作为“物”承载着自梳女的生命印记,更被赋予一种灵性的存在,蜕变为一份跨越阴阳界限的文化遗存。在这一特定的叙事空间内,船作为一种物质符号连接逝去的自梳女与活着的女主人公。这一“物”在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双重象征,使得女主人公与这位已故自梳女的生命经历产生某种超越时间的对话。船上经历脱离物理位移的范畴,演变为一场针对文化与身份的靈魂洗礼。物是文化的载体,“船”作为一种“物”,从简单的交通工具升华为一种文化意象,精准折射女主人公内心的迷惘与挣扎。渡河的过程象征着晓黄在文化身份上的挣扎与确认,她穿越生与死的界限,也跨越了自我与他者的区隔。这并非普通的物质旅程,而是一次心灵的皈依与文化的承接,使她在身份认同上实现升华。“船”作为物的象征,在这里成为华裔女性在中西文化夹缝中寻找民族身份的心理投射,承载自梳女的历史痕迹,指引晓黄穿越历史与个人之间的鸿沟,完成一场深层次的洗礼。借助这一物化符号,自梳女的形象在历史与现实中重新得到诠释,而“船”则化作一条维系生死、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将个体身份的追寻与集体记忆的传承完美交融。

同样,在《金萨:一对之二》同样借助“物”的叙事策略,深描部落的传统文化底色,揭露化传统与个人欲望之间的复杂交织。这篇故事讲述部落首领的一对双胞胎女儿的成长故事。姐妹两人能够心理感应,无需言语媒介便能了解对方的思想。根据占星学结果,姐姐金葵得到一只音管,而妹妹金萨则获得一支利剑,音管和利剑成为文化身份与部落责任的具象化符号。音管象征着智慧、和平和统治的合法性,而利剑则隐喻着力量、武力和守护的职责。金葵面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而是对驰骋草原、挥舞刀柄深感兴趣,暗示出个人意愿与文化规范的对立。于是她将音管丢置群羊饮水的小溪旁,这是她对传统文化框架的主动反思与积极反抗。但受母亲规劝只得再次返回寻找,奈何音管已不知所踪,故事结尾,金萨中箭后即将死去时主动揭露事实真相——她偷拿并藏匿多年,音管象征着部落的统治权,而金萨不满于自己妹妹的身份,无法真正统领部落,于是将欲望寄托在音管这一物体之上,音管也由此从单纯的象征物衍变为权力的媒介。文化传承的重量与个体在身份认同上的挣扎与探索通过物得以清晰显现。

3. 物的能动性 & 情节驱动: 衬衫冲突与纽约诱惑

在物的主体性视域下,物品彻底剥离纯粹被动的客体属性,投射出不容忽视的能动性,具备类似人类的生命和灵性。本尼特宣示,“物”的能动性不仅局限于对人类行为与决策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在于其自身能够凭借特定的行动轨迹(agency)而彰显[10]。观此可见,作为独立实体的物对于文本构建与意义指涉意义重大,在叙事中既能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也揭示人物特征的多重面向。因此,运用物的主体性理论来解读加勒比华裔小说,能够极其深刻地剖析出该群体在重塑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深层心理撕裂与身份焦虑。

《维多利亚》讲述华人移民在加勒比的生存困境与内心挣扎,维多利亚的父亲王是小型店铺店主,由于经济压力无奈破产后,维多利亚与父亲前往哥哥大卫与其基督徒妻子埃斯特在乔治城的住所。王在身份认同方面遭遇巨大挫折,他不适应炎热的天气,“太阳似乎从木头上反射,直指他的皮肤”(p. 12),王对周围环境的噪声也深恶痛绝,绝不靠近烘焙厂一步。个人与环境的矛盾进一步恶化的原因在于埃斯特给王购置一件崭新衬衫,将旧衬衫丢弃。“终其一生,王一次只拥有两件衬衫,一件在洗,一件在穿,两件都严重褪色,柔软地仿佛一层皮肤”(p. 12)。王发现旧衬衫消失后怒不可遏,大叱埃斯特的行为。旧衬衫作为王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他生命体验的物质延伸。这件物品具有实用功能和深层次的象征意义——它是他旧生活的遗物,是他文化身份的具象化,是一种对文化认同的执着。埃斯特的行为在表面上看是出于关怀,旨在帮助王适应新的环境,然而,正是这一行为无意中剥夺他赖以维系自我认同的物质象征。衬衫的丢弃就像一种象征性的剥离,将他与过往、与自身的华人身份强行割裂开来。王

的愤怒并不仅仅是因物品丢失的情绪反应, 而是源于他对文化身份被抹除的无助感。在移民经历中, 物品的丢失经常象征着文化同化的强迫性, 埃斯特为王换上新衬衫的行为, 象征着新环境对他文化身份的抹除。物品在此成为一种对抗身份消融的象征性“武器”, 帮助王在异乡的环境中找到心理慰藉与精神归属。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指出, “一个人的自我是他能够称作是他的所有东西的总和” [11], 即个体的自我界定与其占有物(包括生理、心理及物质层面)息息相关。正如贝尔克所言, 人们“在声称所属物事件时, 逐渐将该物品视作自我的一部分。”。因此, 自我定义与个人拥有物密不可分, 个体身份受到物理环境的客观约束, 物品才成为锚定自我与群体认同的关键坐标。物品化作自我建构的媒介, 塑造出个体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 [12], 在王的身份认同中, 那件旧衬衫正是这样一个承载着文化记忆与身份延续的“另我”。

在文化定位与移民身份的磁力场中, 衬衫作为叙事中的物品已被赋予超乎寻常的象征内涵。它超越作为日常生活所需的蔽体之物, 隐喻着文化记忆和身份归属的载体。物的在场代表着情感符号化的显现, 而物的缺席也无疑会引发故事冲突。王的怀旧情绪, 表面上源于对族裔归属的失落, 深层却潜藏着他对个体及族群认同的执着守望与深刻内省。《当代小说中的伦理与怀旧》中提到, 怀旧的本质绝非止步于对往昔的简单追忆, 更像是在现实困境中探寻伦理出路的一种最优解答。这种对过去的追索超越传统道德常识的限制, 以一种超越民族归属的身份重建角度对自我的重新定位。衬衫引发的冲突揭示王在自我身份建构与归属感找寻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危机。个人与外界关系搭建具备动态性特征, 流散者的身份相较于“存在”(being), 与“变化”(becoming)更具关联性, 跨地域的特质绘制出多语言多文化的混杂性世界地图, 纷繁复杂的物在流散大叙事的身份构建中具有多维意义。

在《高大的阴影》的故事开篇, 主角马拉琳收到堂姐桑德拉从纽约寄来的明信片——附有“来自纽约的问候”的金色苹果图片, 她对号称“大苹果”(the Big Apple)的纽约也由此心生向往, 而残酷的现实是马拉琳必须照顾母亲, 每天在朗姆酒店附近的街头市场售卖烤饼, 赚取微薄的十五美元(p. 23)。而苏丹对她的所有情况了如指掌, 无时不刻凝视着她。这暗含不对等的关系, 不属于简单的观看行为, 构建起苏丹的权威地位与华裔属下群体形象。物时代的降临不仅仅是关于人类的占有物问题, 还讲述了“一个塑造基于物的历史编纂学和人类学的故事” [5]。其背后隐藏着一种现代化特质, 即物的大爆发将是社会内在欲望的外化显现, 同时给予人们“深刻且独特的情感体验” [10]。因此, 人与人物的互动纽带被空前拉紧。伊恩·霍德(Ian Hodder)指出, 这种深化的最核心表现在于人在经济、政治、社会多层面对物的完全依赖, 生理和心理状态也受到物的制约[13], 借物得以窥见现代社会历史与个人心理发展的参与与交织, 正如明信片寄予着马拉琳对于西方发达社会的深切渴望。

透过对物质的渴求与社会地位的象征性建构, 马拉琳对西方世界的浪漫化凝望展露无遗。一位陌生老者苏丹以与其成婚为前提承诺婚后的富足生活, 并允诺带她前往纽约的广场饭店(The Plaza), 共同乘坐电梯到达顶楼俯瞰整座城市。他还尖锐地指出, 纽约的“街头并不是由黄金铺成, 而是充满尸体, 有些死了, 有些还活着(p. 27)”, 这也是其物质欲望的终极体现。然而, 马拉琳心中的梦想之地, 最终只是异国他乡的一个镜像, 物质将她囚禁在对理想的追逐中, 在她拒绝苏丹的邀约后被残忍地用魔法禁锢在相框之中。苏丹的邀约隐晦地显露华裔群体所遭受的来自他国文化的凝视与剥削, 在马拉琳的生活中, 明信片象征着她对西方发达社会的憧憬, 同时也表现她在现实中的物质困境。这种在物质欲望与残酷现实间撕扯的心理落差, 深刻折射出其在文化认同上的迷失。物由此创造出一个新角度去观察与分析人与物的内在联系。

4. 人与物的本体论关系: 湖泊传说与动物隐喻

除却文化隐喻与能动主体性, 物的内在张力还体现在其“独立于人类理性的本体性”(p. 81) [8]作用。

这种独特性在哈曼的理论语境中被归结为“物的神秘性”，布雷西亚的“思辨实在论”进一步说明物的属性和内涵超越人的认知范畴，以一种独立自主的方式对人的物理行为产生影响。金在这部作品改写与再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营构与西方现代文明明显不同的他者空间。在这个场域里，那些浸润着浓厚中国文化底色的“物”，跨越意识形态的藩篱，成功唤醒华裔群体的集体记忆。即便中华文化的奥秘无法全然呈现，其散发出一缕微光也为身份认同危机提供指引，这些“物”归属感的探索提供新的维度。

人类文明的滥觞往往与河流息息相关，水系孕育出辉煌的历史与文化。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水被赋予了“阴”的属性，是五行学说的重要基石，更天然地隐喻着女性的柔美与包容。《船娘之歌》中，晓黄被困在三月岛上时，她仍能在孤寂与艰难处境之中体悟美妙风景，“湖水如丝绸般美丽，在月亮下闪闪发光”（p. 38），她凝视着星星，眼睛不自觉地开始落泪。湖泊可以联系到杭州西湖的白蛇传说。在白蛇传中，湖泊象征忠贞不渝的爱情。虽然西湖是异性恋情感的象征，《船娘之歌》却将其改写为女性之间的情感依恋和承诺之地，形成对传统文化的再造与重构[14]。中国被形容为“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记忆宝库’”（Orville 3），其中存储着无数内涵丰富的“物”，早已剥离单纯的历史陈迹身份，升华为民族认同的图腾。这种超越人类传统认知的神秘力量使得这些“物”在移民叙事中带有一种召唤的力量。晓黄在孤寂中望向湖水，星光倒映在水面上，仿佛是记忆碎片的再现，将她带回遥远的母体文化。尽管她身处异国，对中国文化的记忆残缺不全，这些隐含的文化符号却将她的身份与历史无形中缝合在一起。借助这些文化记忆的碎片，晓黄得以寻找自我和对未来的方向。这一过程是女主人公个体的精神朝圣，也是一场族裔记忆在异度文化空间内的觉醒与复苏。

在此基础上，湖泊的意象进一步延展为对流散者身份认同的深层隐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具有包容性与流动性，而湖泊作为“静止的水”，在保留包容底色的同时衍生出“短暂停泊”的意味。这一停驻的象征恰如其分地呼应华裔移民在异国他乡漂泊无定、寻觅归属的生存症候。湖泊化作一位缄默的在场者，见证主人公的身份挣扎与自我认同的过程，她被动接受周围的世界，并在其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面对文化异域，湖泊成为她内心自我认同的镜像，在这种对湖泊的凝视中，她感受到母体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带来一种心理的归属感，帮助她在情感迷失中获得片刻的安慰。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湖泊是“物”的象征，超越简单的自然元素，成为一种永恒的记忆与情感的容器。在对湖泊的描写中，《船娘之歌》的精妙之处在于，其并未止步于写景，而是借由“物”的超验属性将人类难以言说的内心深处情感表现出来。这种超越人类理性控制的“物”使人类意识到自身的局限与文化根源的深刻性。湖泊作为文化符号连接过去与现在和为一种本体性的存在，维系着身份的连续性和跨文化的记忆。这种“物”的存在模式在文本中构建出一种多维度的张力，使故事情节在丰富的象征之下展现出深刻的文化和情感内涵。《船娘之歌》借助湖泊这一神秘的“物”，实现对中华文化元素的再造，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构建出一种他者身份的空间。湖泊成为跨文化记忆的纽带，承载着族裔传承与文化记忆。

在文学批评的语境下，动物意象往往承载着深邃的表意功能，与政治文化符号密不可分，成为剖析性别、阶级及种族等宏大议题的重要切入点。尼尔斯·汤姆里森认为，“动物性如同向外扩展的复杂网状系统，其中各个元素结构相互流动，主体间相互转换。”[15]在这一理论框架下，人与物(或动物)之间传统的主客体边界被逐渐消解，人类由高高在上的掌控者，悄然滑落为被规训与受制的客体。《高大的阴影》里，在马拉琳与苏丹谈话期间，马拉琳曾多次尝试离开，但或是由于苏丹的言语恐吓，或是因其魔法效应无法动弹，她不由得联想到自己曾用线将蜻蜓绑起来的场景，她“让蜻蜓自在地飞一会，而后随意将其用线拽回，常将蜻蜓囚禁于罐中直至死亡”（p. 29）。而此时被困住的她就仿佛是笼子的蜻蜓一般，呈现出动物的主动性与主体性操演的场域，暗示人类与非人类主体之间复杂的支配关系。“物”不再是死板的叙事道具，充斥着主动性，具有暗示人类被支配的无力感和对主体身份的反思。在另一则故事《短线》（Short Fuse）中，每当主人公从右侧回家时，邻居菲利普斯先生的斗牛犬便会狂吠不止并摇动大门（p.

77); 而当他从左侧回家时, 狗的反应则较为平静。更引人注目的是, 这只狗只会对主人公一家表现出敌意, 对周围其他白人住户却无任何反应。斗牛犬成为一种隐喻, 物的传统客体形象在此衍变为主体, 实现主客融合, 象征着深层的种族歧视, 通过这种“物”的行为揭示出对殖民权力结构的顺从和内心的愤怒对抗。人的主体性被消解和结构, 这种物叙事中的象征性揭示了边缘群体面对歧视时的复杂心理, 表达了其被压抑的愤懑与无奈。“物”超越自身的文化符号化概念, 也是表现身份认同冲突的隐喻工具。

5. 结语

本文重估久被忽略的物叙事, 从“物”的三种叙事功能出发, 探析短篇小说集《船娘之歌》中衬衫、湖泊和动物等具象“物”在宏观的历史语境下, 微观个体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所蕴含的符号象征、主体能动与本体自足。“物”突破生活环境物理属性的藩篱, 衍变为文化象征和叙事工具, 推动角色在多元文化语境下重构自我文化身份和群体归属感。物的变迁勾勒出时代变迁的宏观轨迹, 更映射出个体在多元文化夹缝中重塑身份与族裔归属的抗争史。美玲·金等新一代华裔作家受跨文化语境影响, 作品中常蕴含民族性文化特征, “物”则成为解读深层含义的绝佳切入点, 展露出角色身份认同的复杂历程。此外, “物”为华裔文学研究中的性别、种族等议题呈现新的研究视角和讨论空间, 物作为人物情感与身份认同的象征, 在叙事层面推动情节发展, 直面对身份议题的思考与洞见。通过聚焦中国文化相关的“物”, 厘清加勒比华裔作家在跨文化跨地域的背景下, 应对身份认同危机的三种形式以及对华裔文化根基的重新审视。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4年度岭南文化项目“加勒比地区岭南文化传承传播研究”(GD24LN11); 2025年华南理工大学校级学生研究计划项目(SRP): 加勒比地区岭南文化传承传播研究。

参考文献

- [1] Yun, L. (2008) Linking African and Asian in Passing and Passage. In: Marable, M. and Agard-Jones, V., Eds., *Transnational Blackness*, Palgrave Macmillan, 265-280.
- [2] Misrahi-Barak, J. (2012) Looking in, Looking Out: The Chinese-Caribbean Diaspora through Literature—Meiling Jin, Patricia Powell, Jan Lowe Shinebourne.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American Studies*, 4. <https://doi.org/10.5070/t841012836>
- [3] Lee-Loy, A.M. (2011) Ethnicity: Chinese Characters in Anglo-Caribbean Literature. In: Bucknor, M.A. and Donnell, A.,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Anglophone Caribbean Literature*, Routledge, 309-318.
- [4] Su, P. (2019) Diaspora, Transnational Heritage, and Poetic Interorality. *Zeitschrift für Semiotik*, 41, 25-42.
- [5] Brown, B. (2003) A Sense of Things: The Object Nature of American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ttps://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076317.001.0001>
- [6] 张进, 李日容. 物性存在论: 海德格尔与拉图尔[J]. 世界哲学, 2018(4): 135-143.
- [7] Sattaur, J. (2012) Thinking Objectively: An Overview of “Thing Theory” in Victorian Studies.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40, 347-357. <https://doi.org/10.1017/s1060150311000428>
- [8] 尹晓霞, 唐伟胜. 文化符号、主体性、实在性: 论“物”的三种叙事功能[J]. 山东外语教学, 2019, 40(2): 76-84.
- [9] 张雪峰. “浪漫爱情”的幻灭: 加勒比女性意识与女性话语探微[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23(2): 352-367.
- [10] Bennett, J. (2010)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ke University Press.
- [11] James, W. (1983)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2] Tischleder, B. (2014) *The Literary Life of Things: Case 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 Campus Verlag.
- [13] Hodder, I. (2012) *Entangled: An Archaeolog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s and Things*. Wiley. <https://doi.org/10.1002/9781118241912>
- [14] 苏娉. 崛起中的华裔加勒比海英语文学[J]. 当代外国文学, 2016, 37(4): 108-114.
- [15] Tomlinson, N. (2008) *Animals Crossings: Contagion and Immunologic in Gothic American Literature*. Ph.D. Thesi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